

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 内因决定论思想方法^{*}

张贝可 竭长光

[摘要] 坚持内因决定论、反对外因决定论，是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方法上的重要特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强调内因决定论思想方法的重要性，二者在方法论上具有一脉相承性。从内因决定论思想方法出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强调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过程中，要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内因决定论思想方法，要与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结合起来；要在国家的发展建设中坚持“自力更生”“独立自主”和“自信自立”；要善于通过激发“内生动力”的办法去解决问题；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

[关键词]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方法论 内因决定论 外因决定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党的百年奋斗成功道路是党领导人民独立自主探索开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篇章是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自身力量实践出来的，贯穿其中的一个基本点就是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①“我们始终从国情出发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②。从思想方法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之所以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内因决定论的思想方法。所谓内因决定论的思想方法，即强调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事物自身之内，因而要求从事物自身出发构建理论、制定决策和寻找办法。与内因决定论相对的是外因决定论。与内因决定论不同，外因决定论的思想方法将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诉诸事物自身之外，在这种思想方法的指引下，人们会自觉不自觉地从事物自身之外出发去构建理论、制定决策和寻找办法。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相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中国的百年传承与探索研究”（21AKS003）的阶段性成果。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9页。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2页。

统一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方法论上创造性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内因决定论思想方法。当前，深刻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内因决定论思想方法，对于我们深入贯彻这一思想以及对于提升我们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的能力，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内因决定论思想方法的理解与运用

坚持内因决定论，反对外因决定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观、方法论上的重要特征。不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毛泽东都十分重视内因决定论的思想方法，坚持从内因决定论的思想方法出发去构建理论、制定决策和寻找办法是他们的共同特点。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内因决定论思想方法的运用最突出地体现在他们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性分析以及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论证中。实际上，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展望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并非始于马克思恩格斯，他们之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就做过类似的工作。恩格斯曾指出，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者与启蒙学者一样，都试图建立一个“永恒正义的王国”^①。尽管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他们的“王国”与启蒙学者的“王国”有着天壤之别，但实际上二者在根本的想法上是一致的，即都相信可以通过“头脑”“理性”去构建一套具有“永恒真理”性质的关于未来美好社会的理论，并认为只要将这套理论运用到现实社会中，现实社会就会按照理性设计的那样发生改变。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批判了这种观念。马克思曾精辟地指出，空想社会主义的这种想法实际上是“把未来的历史进程想象为正在或已经由社会思想家协力或单独设计的种种体系的实现”^②，因而它的缺陷在于把社会历史领域中的现实的运动仅仅归结为“个别学究的头脑活动”^③。在马克思看来，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论之所以注定只能是一种“空想”，就在于他们“实质上只是把现代社会理想化，描绘出一幅没有阴暗面的现代社会的图画，并且不顾这个社会的现实而力求实现自己的理想”^④。在恩格斯看来，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这种试图“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并且通过宣传，可能时通过典型示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⑤的做法，由于在现实面前是孱弱无力的，无法搭建起理想通向现实的“桥梁”，因而必然沦为“空想”。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空想社会主义者虽然“怀着悲天悯人的情感，对理想社会有很多美好的设想，但由于没有揭示社会发展规律，没有找到实现理想的有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6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6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8页。

效途径，因而也就难以真正对社会发展发生作用”^①。总之，我们清楚地看到，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论之所以具有“空想”的性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的理论在方法论上具有外因决定论的性质，换言之，在他们那里，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新的社会制度不是内生的，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而是将头脑所发明的“永恒真理”“永恒正义”外在地运用于、“强加于”现实的结果。

与空想社会主义者从头脑出发寻找解释历史变迁和社会形态更替的原因不同，马克思恩格斯从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出发理解这些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一切社会变迁的“终极原因”不能到所谓的“永恒真理和正义”中去寻找，而是应当到生产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基于此，马克思恩格斯认识到，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最终根据”不是基于存在于头脑中的“永恒真理”，而是现实社会中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及其历史性变迁。具体来说，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实质上已经社会化，这种“社会化”要求在事实上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性，即要求社会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却被少数资本家占有，这就造成了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又进一步导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不相容性。换言之，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必将走向自我否定、被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即社会主义社会所取代。因此，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社会主义不是将头脑所发明的“永恒真理”“永恒正义”外在地运用于、“强加于”现实的结果，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发展到顶点的必然产物。总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是资本主义走向灭亡，并被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即社会主义取代的最终根据。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清楚地看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之所以具有科学性，是与这种理论在方法论上具有内因决定论的性质分不开的。

在运用内因决定论思想方法方面，恩格斯的一个独特贡献体现在他的自然辩证法理论中。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从内因决定论思想方法出发批判了自然科学理论中的外因决定论思想方法。例如，恩格斯从吸引和排斥的相互作用出发，批判了牛顿的“第一推动”假设和“热寂说”的“第一炽热”假设以及杜林的“原始状态”假设，这三者的共同特点是从宇宙之外来寻找、解释宇宙运动的最初动因。与之不同，恩格斯认为，宇宙的运动是由自身的内在矛盾（引力和斥力的相互作用）引起的，在宇宙中“一切运动都在于吸引和排斥的相互作用”^②，“宇宙中的一切吸引和一切排斥，一定是互相平衡的”^③，宇宙中的能量只会发生转移，而不会消失，因此，宇宙是自己运动的，其运动的能量来自其自身，不需要外来力量的初始推动。

列宁同样重视内因决定论的思想方法，并由此出发理解发展问题。列宁指出有如下两种基

①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7-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6页。

本发展观：其一，发展是减少、增加和重复；其二，“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①。在列宁看来，第一种发展观点忽视了“自己运动，它的动力、它的泉源、它的动因”，“或者这个泉源被移到外部——移到上帝、主体等等那里去了”^②。换言之，列宁认为，第一种发展观是一种具有外因决定论性质的发展观，而第二种发展观则是一种具有内因决定论性质的发展观，因为这种发展观从事物的内在矛盾出发理解发展问题。从事物的内在矛盾出发说明事物的发展变化，也就是将事物发展变化的原因诉诸事物的内部，从方法论的层面看，其理论实质是内因决定论的思想方法。

毛泽东赞同列宁的发展观，认为那种把发展理解为数量的增减或场所的变更的发展观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发展观，因为“这种增减和变更的原因，不在事物的内部而在事物的外部，即是由于外力的推动”^③。在毛泽东看来，“形而上学家”的特点在于“他们简单地从事物外部去找发展的原因，否认唯物辩证法所主张的事物因内部矛盾引起发展的学说”^④。毛泽东指出，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因为前者“主张从事物的内部”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并且“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⑤。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认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事物的内部，而不在事物的外部，因而，这种宇宙观“有力地反对了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的外因论或被动论”^⑥。正是基于内因决定论的思想方法，毛泽东坚持从中国自身的特点出发思考革命道路问题，走出了一条区别于俄国的、具有自身特点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之路。当然，唯物辩证法在强调内因作用的同时，并不否定外因的作用，而是辩证地看待内、外因的关系。例如，毛泽东指出：“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⑦

二、内因决定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方法论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中国实际，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① 《列宁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06页。

② 《列宁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06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00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01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01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01-302页。

⑦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02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在新时代，中华民族也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新时代是“强国时代”，如何实现中国的强国梦想是新时代的主题。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国”一词共用了30多处。例如，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①再比如，在谈到“到二〇三五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时，报告指出要“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②。又比如，在谈到“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时候，报告强调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③。“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④，可以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对当代中国如何实现强国逻辑的理论表达。作为指引当代中国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世界观、方法论方面具有突出的特征，即它鲜明地体现了内因决定论的思想方法。简言之，内因决定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方法论基础。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把坚持独立自主视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基本历史经验之一，强调“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照搬外国模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⑤。也就是说，一个国家要想实现强大，变成“强国”，那么，就要坚持发展的独立自主性。这种强调发展的独立自主性的观点的哲学基础正是内因决定论。换言之，从方法论的角度看，一个“强国”其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最终根据必然在自身之内，而不能依赖外部力量。正因如此，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自信自立”“自立自强”，强调“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⑥。实际上，不论是强调“独立自主”“自信自立”，还是强调“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其根本都在于将中国强大和振兴的根本原因、最终根据诉诸自身，因而其方法论基础都是内因决定论的思想方法。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1页。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4页。

③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30页。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21页。

⑤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67页。

⑥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7页。

将中国强大和振兴的最终根据奠基于自身是习近平总书记思考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着眼点。例如，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活力和动力”^①。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发展奇迹。然而，随着我国改革发展进入新阶段，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由高速度到高质量的转变已经势在必行。正如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②。为了实现高质量发展就要实现经济增长由外在拉动到内在驱动的转变，这就需要增强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活力。再比如，在建设科技强国方面，习近平指出：“实践反复告诉我们，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③为此，他强调，要“努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④。又比如，在构建新发展格局方面，习近平强调，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⑤。构建新发展格局，首先要求“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⑥。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据。只有立足于自身，将国内大循环畅通起来，才能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中占据有利地位，增强发展的韧性和安全性。当然，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不是关起门来搞建设，而是要通过激发和释放国内市场潜力，高效利用全球资源要素和市场空间，在发展中争取主动性，进而推动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正因如此，党的二十大报告一方面强调“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另一方面也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⑦。总之，构建新发展格局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内外因关系理论的生动诠释。

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尽管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也面临着诸多风险挑战。例如，世界正在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和平与发展受到严重冲击；全球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复苏乏力；逆全球化思潮有所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显著上升；霸凌、霸道、霸权行径不断涌现；“黑天鹅”“灰犀牛”事件等也随时可能发生，西方国家针对中国的讹诈、施压以及封锁，特别是对我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112页。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8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248页。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248页。

⑤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154页。

⑥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8页。

⑦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8页。

国光刻机、芯片、操作系统等核心技术领域创新发展的遏制愈演愈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坚持内因决定论思想方法，增强发展的独立性、自主性，依靠自身实现强大，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正如习近平指出的：“保持定力，增强信心，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是我们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关键。”^①

三、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内因决定论思想方法

鉴于内因决定论思想方法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重要性，因而在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同时，要特别注意贯彻这一思想中的内因决定论思想方法。

（一）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内因决定论思想方法，要与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结合起来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核心。习近平特别重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将其作为兴党兴国的重要法宝之一。他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②作为一种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实事求是与内因决定论的思想方法是相容相通的。众所周知，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唯物主义要求人们“在理解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时按照它本身在每一个不以先入为主的唯心主义怪想来对待它的人面前所呈现的那样来理解；他们决心毫不怜惜地抛弃一切同事实（从事实本身的联系而不是从幻想的联系来把握的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③。同样，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也指出，“唯物主义自然观只是按照自然界的本来面目质朴地理解自然界，不添加任何外来的东西”^④。概言之，由于唯物主义“坚持从世界本身来说明世界”^⑤，因而它也强调要从事物本身出发去说明事物的存在与变化，这一点与内因决定论的思想方法具有一致性。因而，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内因决定论思想方法，要与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相结合。具体来说要着力做到如下几点。

第一，要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理解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263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2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7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58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13页。

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①。在如何选择国家治理体系的问题上，习近平强调：“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②换言之，一个国家选择治理体系的根据不在这个国家之外，而就在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等思想为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确立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同时，当代中国面临的时代问题又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提出了客观要求。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然而，我们仍然面临着一系列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如我国人口规模依然巨大，但老龄化正逐步加剧；共同富裕已迈开坚实步伐，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突出；生态环境明显改善，但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仍有差距。这些现实问题决定了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不能简单地照搬照抄他国，而必须从我国当前的社会实际出发。

在完善我国政治制度建设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历来强调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反对盲目照搬照抄。例如，邓小平曾指出：“西方民主那一套我们不能照搬，中国的事情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办。”^③习近平也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过去和现在一直生长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之中”^④。简言之，那种适用于中国的政治制度，一定与中国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必然深深扎根于中国的社会土壤之中。实际上，由于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政治制度也必然具有不同的特点，不存在普遍适用、定于一尊的政治制度。从方法论的角度看，那种不顾本国实际，照搬照抄他国政治制度模式的做法，遵循的是一种外因决定论的思想方法。然而，历史实践表明，抛开本国国情、照搬他国政治制度模式的做法，非但不能保障本国政治生活的安定有序，反而会给国家埋下动荡不安的严重隐患。因此，推动完善我国的政治制度建设，要摒弃外因决定论的思想方法，不能“看到别的国家有而我们没有就简单认为有欠缺，要搬过来”^⑤。我们要遵循内因决定论的思想方法，坚信只有那种扎根本国土壤之中的政治制度才是最可靠、最管用的，才能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提供制度保障。

法治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关系党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⑥。在完善法治建设方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强调：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法治体系、法治道路，是由这个国家的现实国情、内部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也就是说，一个国家法治建设的最终根据不在本国之外，而在本国之内。正是在

① 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46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105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49页。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286-287页。

⑤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286页。

⑥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40页。

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指出，只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法律文化，从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探索适合自己的法治道路，同时借鉴国外法治有益成果，才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夯实法治基础”^①。那种试图抛开中国的现实国情、照搬他国法治建设模式的做法，既无法满足我国法治建设的需要，也无法推动我国法治建设的有序发展，最终只会因水土不服而导致社会失序。总之，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方面，我们要遵循内因决定论的思想方法，坚持立足我国实际，扎根我国国情，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第二，要使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生长于“我们自己的土壤里”。习近平高度重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在思考如何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问题上，他特别重视运用内因决定论的思想方法，强调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应生长于“我们自己的土壤里”。例如，习近平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加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领域的分析研究，加强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阐释，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这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着力点、着重点。一切刻舟求剑、照猫画虎、生搬硬套、依样画葫芦的做法都是无济于事的。”^②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只有坚持内因决定论的思想方法，坚持扎根本土、立足时代，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才能提出真正具有自主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才能真正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二）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内因决定论思想方法，要在国家的发展、建设中坚持“自力更生”“独立自主”和“自信自立”

毛泽东曾指出：“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③邓小平也指出：“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搞建设，不靠自己不行，主要靠自己，这叫做自力更生。”^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特别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对于当代中国发展、建设的重要意义。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独立自主是我们党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党和人民力量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必然结论。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⑤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再次强调坚持“独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290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44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32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8页。

⑤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29页。

立自主”“自信自立”的重要性。历史实践证明，一个国家、民族的发展，可以在一段时期和一定条件下借助外部力量，但从长远和根本来看，要想最终实现强大和振兴，就必须做到“自力更生”“独立自主”和“自信自立”。

当前，在科技领域强调自力更生和独立自主尤为重要。如今科学技术不仅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而且也关乎一个国家的发展与独立。面对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中国只有增强科技实力，加强自主创新能力，才能在动荡的世界变局中站稳脚跟、赢得主动。特别是针对那些“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关键核心技术，中国唯有自力更生，通过充分激活内部力量，依靠广大科技工作者的自主创新能力去突破“卡脖子”问题。此外，为了在科技领域实现独立自主，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①的理念。总之，只有实现科技领域的自立自强，坚持走自主创新的科技发展道路，才能为国家的独立和强大提供坚实的保证。

（三）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内因决定论思想方法，要善于通过激发内生动力 的办法去解决问题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内因决定论思想方法，要学习、掌握其通过激发内生动力解决问题的办法。下面以扶贫为例简要谈之。消除贫困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历史赋予党的使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决定其必然要团结带领人民努力奋斗，摆脱贫困，实现小康。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脱贫攻坚摆在国家发展的突出位置，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在如何取得脱贫攻坚胜利的问题上，习近平特别强调要“加大内生动力培育力度”^②，强调“脱贫致富终究要靠贫困群众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来实现”^③。实践表明，如果贫困群众没有脱贫的内在动力，是无法在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的。鉴于此，习近平提出，要转变扶贫方式，“实现由‘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帮扶转变”^④；强调“扶贫要同扶智、扶志结合起来”^⑤；强调要积极培育群众的自力更生意识，引导、组织、支持贫困群众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实现脱贫。

从思想方法上看，“输血式扶贫”由于强调外在动力对于脱贫的作用，因而具有外因决定论性质；而“造血式帮扶”由于强调内在动力对于脱贫的作用，因而具有内因决定论性质。从实际效果上看，“输血式扶贫”虽然能够解决一时的问题，但从长期来看容易形成被帮扶群众的“等、靠、要”意识，因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扶贫问题。相比之下，“造血式帮扶”强调的是调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33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90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86页。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135页。

^⑤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90页。

动贫困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注重“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①，因此，这种扶贫方式的效果更持久、不易反弹，更能够确保“真脱贫、脱真贫”目标的实现。有鉴于此，我们不但要在扶贫问题上贯彻“造血式帮扶”的办法，而且还要善于将这种通过激发内生动力的办法去解决问题的思路推广到其他工作中。

（四）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内因决定论思想方法，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

习近平强调：“任何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机械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观点都是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在实际工作中不可能有好的效果。”^② 无论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还是机械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作为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其通病在于不能做到从事情本身出发来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因而本质上都是具有外因决定论性质的哲学方法论。比如，主观主义是指不从实际出发而从主观出发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在主观主义指导下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往往是脱离实际的主观空想。再比如，形式主义的特点是片面追求形式而忽视内容，否定内容对形式的决定作用和形式对内容的依赖性。习近平曾对形式主义的表现作出如下概括：“在形式主义方面，主要是知行不一、不求实效、文山会海、花拳绣腿、贪图虚名、弄虚作假。”^③ 简言之，形式主义不能做到从事物自身出发想问题、办事情。又比如，教条主义的特点在于把书本中的个别词句当作僵死的教条，不是对具体问题进行分析，而是生搬硬套，最终导致主观与客观相脱离，理论与实践相分离。当前，我们已经踏上了实现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在实际工作中破除那些具有外因决定论性质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内因决定论思想方法，以科学的思想方法为基础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顺利发展。

（张贝可系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2019级博士研究生；竭长光系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责任编辑：雪 冬]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31页。

② 习近平：《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求是》2019年第1期。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368页。